

构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的“杂糅空间”

杨 未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是后移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亟需关注的理论问题。从生态移民的地理空间看,需要移民的生态脆弱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混居的地区。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着生态经济与文化生态重建的双重任务。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可以为我国研究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提供借鉴,通过仪式的功能发挥,建构巴巴所说的“杂糅空间”,重建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生态。

关键词: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移民社区;杂糅空间;文化生态重建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4-074-078

DOI:10.13713/j.cnki.cssci.2015.04.014

中国古代有很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为了谋生存,地狭人众的“狭乡”向地广人稀的“宽乡”的人口迁移、有以转产、改业为特征的人口迁移,也有因战争或巩固政权以强制性为主的政治性人口迁移,甚至还有国际性的人口迁移。这些人口迁移可以看成是工程移民或生态移民,客观上促进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下的民族群体的交流与融合。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以及“生态移民”概念的提出,是现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1900年,美国科学家考尔斯首次将群落迁移的概念导入生态学,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了对“生态移民”的关注与实践。生态移民给各个移民族群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生态移民是人口在空间环境上的移动,它不仅涉及迁移人口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与相洽,而是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系统,它不是简单地再现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原貌

或是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还是对于移入地原住民群体来说,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文化不适与冲突,因此,如何进行生态移民社区文化的整合与调适,实现社会系统的文化生态重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生态移民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空间耦合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某个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让某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也指因自然环境恶劣,基本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或不具备就地扶贫条件而将当地人民整体迁出的移民。^[1]生态移民的目的就是使生态系统演替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

20世纪80年代,我国西部地区不少牧区、山区等沙漠化、石漠化节奏加快,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致使居民无法保障正常生活,成为国家指

基金项目: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混杂与融合: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空间建构问题研究”(黔省专合字[2012]50号)。

作者简介:杨未,贵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民族学、发展伦理学。

定的“特困地区”。我国以“易地扶贫”开启的生态移民实践过程就是始于这个时期,1982年开始,宁夏开始探索采取“异地安置”的扶贫方式将此地居民迁居外地,目的是解决“特困地区”的经济贫困问题。此后,这种扶贫方式被引入西部的其他一些省份——内蒙古、青海、甘肃、四川、陕西、贵州等,目的是保护和恢复内蒙古草原、三江源地区的自然生态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生态移民开始大规模的推进。进入新世纪后,国家为生态移民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及规划,2001年6月,国务院发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了对目前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地区的特困人口,要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实行搬迁扶贫,生态移民成为农村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在全国、特别是西部生态脆弱地区推开。^①

在我国,生态移民地区主要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带,与贫困地区高度重合,《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年以来的统计显示,我国绝对贫困人口66%在西部地区,西部贫困的发生以及贫困程度的大小与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贫困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另一方面,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中,有50个集中分布在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2%。^[2]生态移民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高度重合。

以贵州为例。贵州的贫困人口85%以上集中分布在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位于鄂、渝、湘、黔四省(市)交界处,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居住有36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6.2%,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乌蒙山片区则涉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共38个县(市、区),贵州乌蒙山区主要是毕节、遵义的10个县(市、区)也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0.04%;滇桂黔石漠化区在贵州境中涉及5个州(地级市)41个县(市、区),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42.74%,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5.6%。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加之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生态与生存成为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贵州全面实施扶贫生态移民

工程,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生态贫困地区,2011—2013年,贵州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436万人,即便如此,截止2013年,贵州仍有1149万贫困人口,生态移民工程任重道远,因此,在《贵州省2014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中进一步明确“搬迁对象以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特别是石漠化严重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主,迁出地点以生态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地方为主,搬迁区域以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为主。”^②

我国生态移民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地理分布上是耦合的,需要移民的生态脆弱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这种耦合不是偶然的。少数民族地区多是生态脆弱地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依存度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低,加之落后、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只能开发相对容易开发的土地、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但不能有效利用,贫困必然发生,贫困既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同时又是加剧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贫困与生态恶化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少数民族安贫乐命、安土重迁的生活态度不仅是造成贫困的一个因素,同时也影响了其在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态度,因此,这种空间的耦合让我们在关注生态移民社会生态系统重建时必须要注重文化生态的重建。

二、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面临转型

西部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每个民族都按一定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生存,并世代传承。这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条件又由语言、神话、住居、饮食、礼仪、人际关联、生产技能、地理环境等因素组成。这些因素彼此密切关联,相互制约,构成一个系统,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生态。^[3]

从目前生态移民的形态看,主要是为克服生存条件不足而将生态贫困地区的居民迁出,在迁出区进行生态重建,这是国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的制度性安排。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移民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经济、资源、环境等多方面问题,还涉及生活习俗和文化取向的混杂融合问题,生态移民不仅改变了移民群体的

① 中国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100年)》。

② 贵州省人民政府网:《贵州省2014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

生产、生活方式,并对他们固有的思想观念有直接影响,移入地原住民和新移民也面临着融合与发展的问題,生态移民社区面临着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重建的双重任务。

生存技能,生态移民后新移民会选择其他生计方式,如做生意、外出打工。但是,缺乏必要的人脉资源、本身的文化素质较低、劳动技能也较差,市场竞争能力弱,造成移民群体在迁入地择业机会寥寥无几,即使向非农(牧)产业转移,大部分人也摆脱不了低端体力劳动的地位,严重影响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给少数民族移民的生产生活结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迁移过程中,分散了宗族关系和邻里关系,人们失去了原有的日常社会活动秩序,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家庭来说,无论是农耕、收割还是放牧,多是依靠宗族关系和邻里关系以互相帮助的方式完成。生态移民后亲友网络和危难共济关系网络破裂,他们需要选择和建构新人脉关系。如:黔西南兴义市巴结镇从 1994 年开始,农业移民 19936 人(其中库区周围后靠安置 7457 人,跨乡镇外迁安置 12479 人)这些,移民主要是布依族,他们分别安置在万屯、郑屯、桔山、马岭、则戎、下午屯、顶效、鲁屯 8 个乡镇的 15 个安置点,赖以维持生计的生产只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主,人手的不够是他们面临的实际困难。再比如“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三江源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研究”中,对青海省泽库县进行了调研,根据移民工程最初的设想,移民家庭中畜牧业从业比例应接近于零,调查发现移民家庭存在较大比例返牧现象,对于传统的能源——牛羊粪的使用习惯,使其在电能上花费低于牧民家庭,由于减畜禁牧的三江源区因牛羊粪数量减少市场价格升高,反而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负担。^{[4]1178}

沟通与交流出现障碍,期待维持和延续本民族的文化脉络。移民社区的人口规模是“规划”好后给定的,集中安置的方式下,为保证社区的整体性,小规模安置区的移民多来源于同一地区,这些地区也多是同一民族,交流不存在语言障碍,也不会有太多的文化冲突,但是,大规模的安置区,移民可能来自不同地区,语言、习俗都不同,就会产生文化冲突。分散安置的方式,有少数移民穿插安置在一个社区中,作为少数人的他

们,即便是语言相通,也会在心理上存在不适。

移民社区的住房也多是“规划”好的,样式统一的房屋和新的地理环境打破了原有地域空间存在的安全感,加之故土难离的思想和对旧社区的惯性认同,情感归属感、认同感也随之受到影响,对于那些分散安置的移民来说,还会产生在新居住地的孤独和疏离感,零散的移民可能会变得孤单,甚至会被迁入社区边缘化。从文化势差^①的角度进行分析,处于少数民族地区或经济落后地区的移民,更有可能采取调整自身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被动或主动地适应迁入地的生活方式;如果移民占多数,就可能会将本族群原有的价值观念、习俗强加于迁入地,对具有相同族源关系的移民,迁入地社区的原著居民可能会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但是,对于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移民或他民族的移民,就会采取歧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在生态移民工程推进的过程中,移民对迁入地生活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会越来越关注,对民俗仪式、文娱设施、邻里关系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环境产生更高的期望,不论基于何种原因,他们会对维持和延续本民族的文化脉络有所期望。

面临着社区的“陌生化”,文化生态需要重建——生态移民社区与传统社区相比,更加侧重于“共同地域”。传统社区是以多是血缘群体的组成的村落为依托高度聚集的地域空间,具有自然的村落边界,通常以河流、空地、山林等为标志。传统的血缘群体村落人口规模较小,血缘关系浓厚,家庭是基本生活单位,家族观念深厚,人际关系密切;传统的自然村中往往只有简单的生活服务设施,由于它是世代繁衍、共同生活的结果,人们对本村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即使是建国后的行政区划形成的一些行政村,虽然打破了各村落之间的血缘和地域界限,但其应有的传统联系并未削弱,由于长期的相处,习俗、道德、舆论等非制度化的社会控制方式起着较为重要的整合作用,对行政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较强。

生态移民针对生态脆弱或生态极端恶化地区的“易地扶贫”措施,最初在我国实施时就是以通俗易懂的口号——“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没水

^① 文化势差是任继愈先生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文化必能影响低层次的文化,相同层次的文化接触后,谁也支配不了谁,往往相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任继愈:《文化发展的势差规律》,载于《群言》,1987(12)。

的地方走旱路,水旱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为基本思路,因此,注重的是地域选择,带来的是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及功能降低,属于自己的时空制度被打破。当下生态移民与“逐水草而居”的移民不一样,不是整个族群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堆在牛车、或马车上,从此地出发,寻找新的生存地,在大地上蜗行前进。整个血缘家族的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相互的保护,强化了血缘意识,固定下来后多采取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模式,村落与家族多是重叠的,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经过代代繁衍及家庭的裂变,形成了共同拥有“开基祖先”的宗族。他们的生活节奏表面上看是顺其自然的,按季节从事农业生产,按节气安排农事;有着自己的祖先崇拜,不同的祭祖方式,世代传承的文化样式。生态移民后在新的生活社区会面临着文化生态的“陌生化”,移民既有的社会伦理文化难以顺利地进行群体性生活,如果应对不当,都会成为移民族群自我发展的巨大障碍。

三、构建生态移民社区文化多元的“杂糅空间”

生态移民社区的建设如前所述,人口规模有限制,确定了地域区位并进行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成为生态移民社区构建的最初条件,生态移民既是经济行为,也具有文化意义,无论是移民还是原住民,都必然经历着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或体验,社区成员的适应状况反映着社区构建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妨借鉴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来关注一下生态移民社区的建设。

霍米·巴巴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话语“神圣三位一体”(萨义德、斯皮瓦特、巴巴)中的重要一员,是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他的著述不多,但却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是当今世界上后殖民理论最主要的阐发者之一。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是针对多元文化交错共生于同一时空时的文化生态提出的。

巴巴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了各种时空,纯粹和单一的文化时空已不复存在。整个世界的文化都日趋间隔化和杂合化,民族是叙述的建构物,它来自不断冲突的各文化要素之间的混杂与相互作用;民族的形成不是由种族、语言、宗教、地理等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对某种丰富的记忆遗产的共有以及在当今达成了一种共识,愿意

共同居住在一起,愿意保持并发扬他们共有的传统价值观念。民族是一种源自深刻的历史复杂情境的“精神原则”,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有益的,是一种道德良心;但民族又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有始有终的。他认为存在着“总可以相互商讨的民族边界”。^[5]

我国的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的移入地社区,均为两个或多个文化在同一空间中遭遇、碰撞、交往和互动的社区,这样的社区状况其实与霍米·巴巴所关注的生活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借鉴他的混杂性文化理论,对我们探寻移民社区文化重建图景和内在机理具有很强的启发性。^[6] 只要是为了共同的家园——生存环境,为了构筑美好生活,生态移民社区的文化生态重构是可能的。

少数民族生态移民后文化“重建什么”和“怎样重建”呢?

期待“传统得以发明”。历史上各类移民与迁入地民族长期杂居,移民后代的经济生活、文化特征已逐渐淡化其民族特色,经过社会交往和接触,自身的文化也散播开来,逐渐为迁入地社会所接受。比如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社区的形成,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有着自己的符号、规则和运作机制的“小社会”,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城市亚系统,移民携带着生产技术在异地迅速地建设起生活所需的住房、商店,甚至学校、医院、商场、广播站等。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一些新的文化符号——“发明”了“厂矿普通话”、军队生活的节奏、婚丧嫁娶时分工合作的团队。他们按照一定的“实践结构”进行交流,在特定的界域内利用和“消费”语言符号。生态移民族群虽然与他们不同,没有携带生产技能,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当两种文化碰撞时,势必会造成生态移民族群的文化退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退让不等于消逝,新的文化符号在不断产生,融合是必然的。

霍米·巴巴认为,疆域、传统和民族认同确实给人以重要的归属感,但如果我们太过强调、甚至崇拜文化、民族认同或传统,或者如果这种链接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就会导向一种限制性共谋,会将我们带回到19世纪那陈旧的社会文化范式中。重建文化差异的话语不只要求文化内容和象征的简单变化。这种重建需要对社会的时间性作彻底的修订,在这种时间性中,正在出现的历史或可被书写:“符号”重新发声,其中

文化身份或许被刻写,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4]¹¹⁷⁸

霍米·巴巴还认为:“物体需要同‘他者’和另类的时性协商,同时开启了社会差异和他性的空间”,古老的艺术形式与当代的数字形式调和时,艺术家们是可以在修正现时的文化史的同时也重新了传统。^[7]在借鉴霍米·巴巴的这一观点,并将其应用于少数民族移民社区建设中,我们发现,生态移民社区的融合中,重构新的“文化符号”,重新刻写各自的文化身份,传统是可以发明的。

用仪式重构杂糅空间。生态移民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移民都不一样,尽管都面对因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生境和人际社会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和异质性文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面对原住民产生文化不适,另一方面则是与原住民一起面对的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民族经验变得破碎不全,民族认同也出现了裂纹。霍米·巴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构认同的路径——必须在过去的“回声”中理解当代的现实;要通过重新安置和调整“他者”;为了处理这些冲突的文化差异中的“居间的”范畴,巴巴指出:“正是在间隙的现身之处——差异之领地的交叠和移位处,民族性、社群利益或文化价值的主体间性和集体经验才能够被协商……”,“就文化身份而言,混杂性是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是分离迥异的,而是总是相互碰撞的,这种碰撞和交流就导致了文化上的混杂化”^[8]。

巴巴主张通过“协商”开始了一种新的言语行为,主张两种文化情境彼此杂糅,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过渡空间。他认为多元文化的混杂,不但使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切穿插的可能,这种跨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生的意义得以产生。

因此,我们建议通过仪式来进行杂糅空间的文化生态重建,中国本来就是礼仪之邦,仪式是连接传统社会内部关系的重要纽带,它是由传统发展而来,是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可以帮助人们互相理解。仪式本身也具有再生产和再塑造的特征,比如中国传统的红白喜事,不

仅是对新人的祝贺或是对死者的哀悼,更是对社区“网络关系”的确认。各类仪式活动中重申道德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集体的参与可以促进生态移民社区的认同与团结;另一方面仪式可以让个人的失落与不满游戏化,成为情感表达的渠道,化解矛盾。仪式就是一整套通常由已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它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通过不断的重复得以实现。它是承袭传统,同时也是制造传统、发明传统的工具。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各民族文化混杂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是今天的“贵州文化”,它其实就是各民族(族群)文化的混杂融合——宋元时期的“军马经济”、明代的“屯堡社会”、抗战时期的“战时经济”和“流亡文化”、以及建国后的“三线建设”等,这些先后移入的文化形态都是基于共同生存环境下的自我生长并与其他文化混杂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对贵州当地的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全球化的进程中,尽管物质边界和观念边界都在漂移,新的文化符号在不断产生,文化不仅是一种形态,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尊重与对话、混杂与融合,建构一个杂糅空间,对于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的文化生态重建无疑是一种借鉴。

参考文献:

- [1]梁福庆. 中国生态移民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4):11.
- [2]童玉芬,王海霞.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贫困原因及其政策启示[J]. 人口与经济, 2006(01):10-15.
- [3]纳日碧力戈. 民族文化生态与现代化的适应[J]. 民族学研究, 第十辑, 1991:79.
- [4]齐月,刘伟玲,等. 生态补偿对泽库县牧民与移民生计影响的比较[J]. 草业科学, 2014(06)
- [5]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80-83, 113-119.
- [6]戴庆中. 混杂与融合:少数民族生态移民社区文化重建图景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12).
- [7](英)霍米·巴巴. 全球化与纠结[M]. 张颂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27.
- [8]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2.

[责任编辑:明秀丽]